

心理學理論應用於中國傳記研究的一些問題

張瑞德

一、前言

心理傳記 (Psychobiography) 的起源，我們雖然可以一直向上追溯至古希臘的劇作家，但是大多數的學者均承認近代的心理傳記始於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一九一〇年所出版關於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的傳記。(註一) 近半世紀以後，由於心理分析學家艾瑞克森 (Erik Erikson) 等人著作的出現，而使心理歷史學逐漸蔚為顯學。就在艾瑞克森的名著「馬丁路德的青年時代」(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958) 出版後的第二年，阿瑟·萊特 (Arthur F. Wright) 發表了「楊帝帝」一文。(註二) 是為將心理學應用於中國傳記研究的第一篇作品。三十餘年來，已有不少歷史人物的心理傳記出版，如武則天、明太祖、鄭成功、清世宗、清高宗、洪秀全、孫中山先生、章炳麟、宋教仁、魯迅、蔣中正先生、蔣夢麟、毛澤東、梁漱溟等人，均有學者從事研究。(註三) 現有的研究成果雖已不少，但是成功的作品却不多見，本文試圖檢討其中的原因，並希望能經由中西傳記傳統的比較，找出中國傳記的特質，以作為從事心理傳記研究時的參考。

二、現有成果的檢討

關於中國歷史人物的心理傳記之所以大多不甚理想，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項：

第一、傳記未能和歷史相連。心理傳記應試著將傳主個人心理上所面臨的問題和他的時代連結起來。一篇成功的心理傳記，即如艾瑞克森所指出的，應該致力於探討傳主是如何的能夠「反映了他的時代」(Prototypical for his time)，並且「滿足那些追隨者生命中的特殊需要」(註四)。有位研究宋教仁的學者，從宋氏日記中發現他曾有過同性戀的經驗，但是如果無

法找出同性戀的經驗對他的行為（甚至歷史）產生了何種影響，則這篇作品只能為讀者增添一些談天的資料，對於歷史知識實無多大貢獻。

第二、未能將傳主和同時代的其他人作比較。一位成功的心理傳記作家應着力於探究何以在面臨同一挑戰（刺激）下，傳主產生了某種反應，而他人却作了另一種反應，否則極易流於自圓其說。

第三、傳記資料的缺陷。大多數的人格理論（尤其是人格分析理論）在解釋動機時，不是將其歸因於潛意識，即是將其追溯至童年時期的經驗。雖然艾瑞克森將佛洛伊德的人格形成過程延長至青年時期，但是學者仍然苦於資料的不足。事實上，這也是研究西方歷史人物時所常遭遇到的問題，但是較嚴重的是中國傳統的傳記資料似乎較難以心理學解釋。因此，以下先將中、西傳記的傳統作一比較，以找出中國傳記材料的特質。

（一）中西傳記相似之處

中西方撰寫傳記的最初動機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目的都是在讚揚死者和垂訓後世。東西方傳記的形式也極為相似，顯示出傳記是一種普遍的文學表現方式。在篇幅方面，胡適以為西方多長傳，而東方多短傳。（註五）事實上，直至十九世紀，西方傳記作家由於重視史料，喜歡在傳記中大量引錄書信、檔案等史料的原文，大部頭的傳記才普遍出現；（註六）而中國的傳記史上也曾出現過一些長傳，例如唐代慧立、彥棕合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簡稱「慈恩傳」）有十卷八萬字，宋代朱熹的「魏公行狀」也有四萬三千多字。（註七）不過，大體來說，中國的傳記大多仍為千言左右的短篇。

（二）中西傳記相異之處

中西傳記最基本的不同在於西方傳記的寫作有逐漸強調個性（individuality）、強調描繪個人差異和特質（peculiarities）的趨勢，在中國則無。在古代，西方人除了像普魯塔克（Plutarch）之類的天才外，對於個人的人格大多不感興趣。中古時代，除了像安哈德（Einhard）所撰「查理曼大帝傳」（*Life of Charlemagne*）之類的突變外，沒有一篇傳記能對一個人有生動活潑的描寫。一般的聖徒傳記（hagiography），所描繪的只是一個固定的形象（stereotype）而不是一個人。但是文藝復興後，情況開始有了改變。傳記不再只是帝王將相和聖賢的專利品，而將視野擴大至描寫藝術家、作家，甚至雞鳴

狗盜之輩；傳記的篇幅和風格也變得多樣化；在約翰生（Samuel Johnson）的時代（十八世紀），求真至少已成為一些傳記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標。（註八）與西方相較之下，中國傳記的特點即立顯出。中國自周代以降，人文精神即一直高度發展，而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反映於傳記者，即為種類的繁多與數量的龐大，（註九）傳記寫作的對象自史記起即包羅了社會各階層的人物。這些都遠較西方為先進。但是，中國的傳記大多不重人格和個性的描寫，而注重他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傳記作者所真正關心的並非是個人，而是個人對歷史（家族、鄉里或國家的歷史）的貢獻。由於個人主義的不發達，傳記作品自然易於忽略人類性格的複雜性，只有在少數儒家勢力衰弱之際，傳記才有短暫的發展。例如東漢滅亡後，儒家思想失去獨尊的地位，個人有機會掙脫傳統的束縛。這種個人意識覺醒的結果，不僅使傳記作品在質和量上都大為興盛，就是個人的性格也開始受到注意。但是這種進展僅只是曇花一現，至唐朝政權成立，儒學的正統地位重新建立後，即告中止。至於東漢末年輸入中國的佛教，透過翻譯的經典，對於傳記也產生了一點影響。佛教的理想之一是要使人擺脫家庭、宗族的羈絆，甚至擺脫對於君主應盡的義務，因此傳記內容有重視個人的傾向；印度佛教的史詩傳統也豐富了中國傳記的形式。但是，佛教對於中國傳記的貢獻仍極有限，因為印度的佛教文學傳統雖重個人，然只是注重描述那些特殊人物是如何的征服了他們的自我，如印度王子的成佛經過，對於俗人的傳記則未見影響。相反的，這個時代大家族勢盛，重視譜牒、世系，導致家傳、行狀、墓表、廟碑的流行，因此雖有重視個人的傾向，但却因世家大族的勢盛而無法伸展（註一〇）。

中國傳記的不注重人格和個性的描寫，除了上述個人主義不發達的原因之外，中國沒有像西方一樣可以促進傳記發展的文學背景，以及中國傳記的長期附屬於史學均值得作深入的探討。

傳記如要成為獨立的文學作品，一項先決條件是這個社會必須能將一個人的性格及性格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為足以吸引讀者注意力的事物。這種對於個人本身的興趣，在西洋古代，乃是表現於英雄史詩，至於人的力量與其環境力量衝突，則是表現於希臘悲劇。英雄史詩和悲劇傳統對於西方傳記都有重大的影響，並且使西方讀者的興趣集中於個人本身。但是由於史詩和悲劇在中國都是從未有過深厚基礎的文學形式，以致傳記未能自此汲取養分（註一一）。

此外，中國傳記與史學的關係過於密切，或許也使得傳記不注重個人人格和個性的描寫。

我國最偉大的傳記作家司馬遷即為歷史學家，他在傳記上的成就絕不遜於古希臘的朴魯塔克（Plutarch），但是史記的體裁一直為後代所遵循，而少有變動，註定了傳記附屬於歷史的命運。雖然司馬遷為傳記文學開了路，但是也將傳記置於歷史的框架之下，直至二十世紀初期，由於梁啟超、胡適等人的努力，才使傳記逐漸獲得獨立的地位。在西洋的圖書分類法傳入中國以前，傳記一直被列於史部。雖然傳記在西方也常被視為是史學的一支，直至十九世紀才開始成爲一種獨立的文體，（註一二）但是中國傳統傳記所受史學的影響實遠較傳統西方傳記爲大，傳統中國將撰史視為極嚴肅之事，所謂「蓋棺論定」，對於史文的要求也較行狀、碑誌及其他文學作品爲高。史家懷於責任的重大，因此用字也務求慎重，一字一句都要有來歷，即如章學誠所說的：「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學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爲言之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註一三）在這種心理壓力之下，實難想像史家能寫出生動活潑的文字，遑論探究傳主的人格和個性了。因此，傳記之無法獨立爲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也可作爲部分理由說明何以自司馬遷以降，中國能有偉大的文學作品（如詩詞歌賦），但是却少有偉大的傳記作品。

三、展 望

如前所述，以心理學的概念、技術和發展應用於中國歷史人物研究的現有成果，由於寫作方法的不當或是受到資料的限制，加上理論本身的限制（註一四），以致於成績並不理想，展望前途實不甚樂觀。但是，至少仍有兩大理由支持這項工作的繼續進行：

第一、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可以協助我們解釋人類的行爲。有些人反對使用心理學的術語，事實上，正如艾瑞克森所指出的，即使是反對心理學的傳記家也不自覺的在心理學。（註一五）人類一些在以前無法解釋的行爲，或許經由心理學的知識即可解決。此外，一些在以前被視為無用的資料，可能都可增加我們對於過去的瞭解。札記本、草稿紙……這些「廢物」或許都可被我們拯救而再生（註一六）。

第二、傳記資料可用來檢驗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的理論。因爲這些概念常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概念，

不同時空下的生活史資料都將有益於理論的修正（註一七）。

在資料方面，經由中西傳記傳統的比較，我們發現中國的傳記較不注重個人的個性和性格，因此頗不利於心理學的應用。但是，這並不表示中國完全缺乏內省的（*introspective*）史料。事實上，顯露出個人情感的材料不在正史中，而在他處，例如文人的筆記，理學家的語錄、困學記，清代帝王親自批示過的奏摺等，尚有賴學者的努力發掘，至於近代人物的日記、自傳、回憶錄等就更多了。

附 註

註一：George M. Kren and Leon H. Rappoport, "Introduction: Values, Methods, and the Utility of Psycho-

history," in George M. Kren and Leon H. Rappoport, eds., *Varieties of Psychohistory* (N. Y.: Springer, 1976), pp. 7-8. 關於心理歷史學在佛洛伊德以前的發展，可參閱：Frank E. Manuel, "The Use and Abuse of Psychology in History," in Felix Gilbert and Stephen R. Graubard, eds.,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 Y.: Norton, 1971), pp. 211-237.

註二：Arthur F. Wright,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in Arthur F. 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7-76.

註三：雷家驥，狐媚偏能惑主——武則天的精神與心理分析（台北：聯鳴，民七〇年）；黃小平，「朱元璋：一個歷史和人格的研究」，師大學報，第廿四期（民六八年六月），頁一三九—一六一；Ral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ei Huang,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a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Harold L. Kahn,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ow-ming Yap, "The Mental Illness of Hung Hsiu-ch'uan, Leade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 3 (May

1954), pp. 287-304. 聶崇章, 「孫中山先生革命人格的形成」(未刊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民六三年); 黃克武, 「章太炎的早年生涯——一個心理的分析」, 食貨月刊, 復刊第九卷第一〇期(民六九年一月); 朱汝源, 「宋教仁的革命人格」(未刊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民六六年); 李歐梵, 「『魯迅內傳』的商榷與探討」, 明報月刊, 第五卷第一二期—第六卷第三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九七一年三月); 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張瑞德, 「蔣夢麟早年心理上的價值衝突與平衡」, 食貨月刊, 復刊第七卷第八期(民六六年十一月), 頁四四六—四五一。 Lucian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 Y.: Basic Books, 1976);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註四: Erik H. Erikson, Dimensions of a New Identity: The 1973 Jefferson Lectures in the Humanities (N. Y.: Norton, 1974), p. 14.

註五: 胡適, 藏暉室劄記(上海: 亞東圖書館, 民二八年), 卷七「傳記文學」條。原文成於民國三年九月廿三日。

註六: A. O. J. Cockshut, Truth to Life: the Art of Biography in the Nineteen Century (N. Y.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p. 18.

註七: 朱東潤, 「中國傳敘文學的過去與將來」, 學林, 第八輯(民三〇年六月), 一一—一二四。

註八: John A. Garraty, "Chinese and Western Biography: A Comparis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2 (February 1962), p. 488.

註九: 即以正史而論, 即有百分之六十二的篇幅屬於列傳。參閱: Yü-shan Han, 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ollywood: W. M. Hawley, 1955), p. 202.

註一〇: Wang Gungwu, "The Rebel-Reformer and Modern Chinese Biography," in Wang Gungwu, ed., Self and Biography: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As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98.

註一一: D. C. Twitchett,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in W. E.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10.

- 註一二：Richard D. Altick, Lives and Letters : A Histo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 Y. : Knopf, 1969), pp. 78-80.
- 註一三：章學誠，「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收於：章氏遺書（吳興：嘉業堂，民一二年），章一四，頁二三下。
- 註一四：Hans-Ulrich Wehler, "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Social Research 473 (Autumn 1980), pp. 526-29.
- 註一五：Paul Roazen, Erik H. Erikson :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a Visoin (N. Y. : The Free Press, 1976), p. 73.
- 註一六：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 Y. and London : Holmes & Meier, 1979), p. 71. 反對將心理學應用於史學研究的學者，對於一些濫用這種「觀察力」的傳記作者則大加責難：「如果傳主的煙斗落在地上，（作者就會說）他有不小的心的個性；如果他又將它拾了起來，則他就有小心的個性。」參閱：Jacques Barzun, Clio and the Doctors : Psycho-History, Quanto-History &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54. 這當然是不當的批評。
- 註一七：Erik H. Erikson, Life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N. Y. : W. W. Norton, 1975), p. 257.